

新时代社区公益慈善的逻辑定位与推进维度

赵文聘

【摘要】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新时代社区发展有了新的历史使命和要求，社区公益慈善可以成为应对当前社区发展难题、建设“积极社区”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新时代社区公益慈善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需要将中华慈善逻辑与当代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社区公益慈善发展。可以从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利益性公共生活三个维度勾勒社区公益慈善助力“积极社区”建设的逻辑框架。发展社区公益慈善，应在积极解决社区内部需求和难题中，促进社区内外走向联动；在社区共同利益发掘和维护中，促进社区成员走向越来越紧密的联合，进而促进社区的有机团结，不断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和社区文明程度。

【关键词】 新时代；积极社区；公益慈善；公共生活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是群众主要的生产生活场域，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社区公益慈善在城乡社区具有重要价值，与基层政权建设和群众自治组织有机结合，不仅符合中华邻里互助的传统与现行体制，而且畅通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增进了社会团结，进而可以为国家治理奠定稳定的根基。^①

近年来以城乡社区建设、社区公共文化营造等目标的社区公益慈善迅速发展，社区互助、社区捐赠、社区慈善基金会、社区慈善超市等形式层出不穷。例如 2013 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和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意见》，截至 2023 年上海全市已有两百三十余家慈善超市，不仅实现了街镇乡全覆盖，而且已经在尝试通过差异竞争靠服务“黏”住居民，^② 青岛发布《关于探索设立社区慈善基金的意见（试行）》，江苏镇江、昆山等地推进社区慈善社工室，广东番禺等地建设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

新修改的《慈善法》在第 120 条规定“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可以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并在第 96 条明确“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

【作者简介】 赵文聘，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益慈善与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研究”（21&ZD184）。

①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社会治理》2020 年第 10 期。

② 王嘉旸：《走过二十年，慈善超市在沪遍地开花》，《文汇报》，2023 年 9 月 4 日第 1 版。

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这反映出各界对发展社区公益慈善的重要性形成了初步共识。但《慈善法》并没有专门对社区公益慈善设置详细的规范,实际上也反映出当前各界对如何推进社区公益慈善并未形成共识,对新时代社区公益慈善的理论和实践要求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包括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强调亲友相济、邻里互助、家庭保障的社区互助与当代慈善的现代性结合,进而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社区公益慈善等都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关注的议题。

二、“积极社区”:社区公益慈善的重要逻辑

探讨社区公益慈善,首先需要明晰当代社区的功能和定位。对于社区的理解林林总总,仅关于社区的定义已多达140种。^①费孝通将社区界定为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②徐永祥认为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的生活共同体,^③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实际上,在关于社区的诸多理解中,作为居住场所的社区是最为基本的内涵,共同体的归属感是更高层次的追求。^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就新时代社区工作,2017年、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社区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社区中国”已经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范式,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⑤新时代的社区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发展要求,成为基层政权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和谐团结、群众美好生活等各方面工作和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社区发展的各项目标需要通过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和实现“社区共享”来达成,^⑥是一个广泛动员、深度互动的过程,这种动员和互动过程“既

① 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② 费孝通:《中国现代化: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③ 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④ 鞠春彦、李凯:《“老有所为”: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实现积极老龄化》,《人文杂志》2020年第6期。

⑤ 刘建军:《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⑥ 林闽钢、尹航:《走向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建设——基于社区治理类型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建构现代国家，也建构现代社会，更建构行动者自身”，^①通过社区为城乡注入发展的能量，为国家奠定治理的基石，是中国未来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②

然而，当前社区发展呈现出国家在行动、社会行动不充分、居民不行动的困境，^③居民社区参与表现为“强个体性、弱公共性”，社区自组织运行呈现出“强行政性、弱自主性”，同时社区外部服务供给越充分，居民依附性越强、自治性越弱，积极的、有公共精神的、信任的社区网络也愈加难以形成。^④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除了以兴趣为基础的专业社团之外，公共生活是非常贫乏的。城市发展的现状似乎昭示着一种更加悲观的前景，这就是本来就有限的公共生活与社会交际也呈现出衰落趋势，概括起来就是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社会关系的断裂。^⑤然而悲观并不能解决社区存在的困难，更不能完成推动新时代社区发展的使命任务，社区中的各种力量、各种温暖是积极看待、积极推动社区发展最厚重的依赖。实际上积极老龄化的相关理论实践对推进新时代社区建设有极强的借鉴意义。人口老龄化一度被看作发展负担，认为人体机能退化非人力能够干预，但从上个世纪末各界开始认识到需要“积极老龄化”，联合国于2002年在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将“积极老龄化”写入《政治宣言》中，成为了各国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原则性框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世界卫生组织将“积极老龄化”阐释为“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⑥并围绕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维度提出六组用于具体测量的指标体系。在“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龄群体具有应对个体和群体老龄化挑战的能力，被鼓励和平衡个人责任（自我照料）、代际友好与团结，以提高社会的活力。“积极”不单是指积极地获得健康，也包括能持续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以权利为基础，多部门和代际通力合作的三个前提及生命全程观点，还体现为政府、研究者和大众都应该有所作为。^⑦

新时代社区建设同样需要“积极”理念，这意味着各方有所作为、通力合作，共同实现新时代社区发展使命和任务，而“积极社区”也需要积极提升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积极促进稳固共同体的形成，积极面向高品质生活，提升社区品质和社区文明程度。

（一）“积极社区”的“积极动力”。学界认识到，行动者参与的不足使得社区总是成为管理与服务的被动接受者，社区治理的主体性以及内生动力无法激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治理更是无从谈起。^⑧社区内生动力的激发并不容易，实际上社区居民参与呈现一种非正

① 孔娜娜：《行动者、关系与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转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② 刘建军：《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③ 陈伟东、陈艾：《居民主体性的培育：社区治理的方向与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④ 尹浩、舒晓虎：《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主体性培育路径研究》，《求实》2018年第4期。

⑤ 刘建军：《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⑥ 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华龄出版社，2003年，第7页。

⑦ 邬沧萍、彭青云：《重新诠释“积极老龄化”的科学内涵》，《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第17期。

⑧ 唐亚林、钱坤：《“找回居民”：专家介入与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再造》，《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

态分布特征,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以及越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群体的社区参与度越低,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以及年龄大者的社区参与度相对较高,^①家庭、市场和社会支持决定了个体的自我满足能力,也关联着其对社区的依赖程度,社区居民对邻里关系构建与社区参与具有能动性、选择性与非完全性,^②个体如果普遍对社区依赖程度低,社区内生动力必然弱化。“积极社区”致力于解决社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合居民对社区生活秩序、社会生活温度、社区生活品质等方面的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尤其是对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够覆盖到的范围之外的需求进行甄别、梳理并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服务和支持,使得社区内的多样化的急难愁盼的需求能够及时得到回应或满足。当前我国城乡社区内生动力弱的问题,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人口流动、快速城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阶段性特征。人类寻求社区参与和社会链接是本能,弗洛姆指出,现代人的问题并非缺乏理性,而是缺乏爱与纽带,个体面对着与自己完全分离、自成一体的外在世界,必须克服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和孤独状态,道路之一是沿“积极自由”前进,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③创造连接纽带,提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依赖,使其从社区发展中产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增强社区成员参与的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积极社区”获得持续“积极动力”的路径。

(二)“积极社区”中的“积极共同体”。社区是人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实现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④并将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⑤休谟认为在共同体中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⑥费孝通指出社区“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⑦社区共同体对社区成员的发展是具有重要助益的。滕尼斯提出了三种以情感导向为基础的共同体的类型: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将人的本质意志作为共同体形成的基础。^⑧当前中国城乡社区血缘、地缘共同体意识淡化,现代社会包含多层面的共同体,如文化权利和公共性等诸多因素的生活共同体,不再是习惯于服从群体习惯、他人组织好的精神生活的那种“同质共同体”。^⑨共同利益是促进城乡主体之间紧密互动并展开集体行动的驱动力,能够促进城乡主体之间更高效更协调地开展合作,^⑩新公共管理理论极力主张治理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

① 桂勇、黄荣贵:《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② 张雪霖:《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③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⑥ 休谟:《人性论(下)》,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26页。

⑦ 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⑧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5页。

⑨ Robert Redfield, "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1941, p. 16.

⑩ 张艳、曹海林:《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路径》,《中州学刊》2021年第11期。

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①“积极社区”需要着力解决城乡社区内部的相互孤立甚至对立的情况,激发城乡社区共同体意识,不仅及时解决社区邻里和社区的眼前的事情,还可以用更为开放的、更灵活的方式就涉及社区长远发展的事务开展协商和共同处理行动,在社区秩序、全龄友好、社区品质等方面培育和凝结社区新公共利益,促进城乡社区内部结成较为稳固的、更为积极的共同体。

(三)“积极社区”的“积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培育时代新风新貌。^②“积极社区”需要关注社区居民的高品质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高品质生活”的概念,高品质生活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保障,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期待和满足,具体体现在健康生活、就业与共享、教育机会均等、家庭与就业、收入分配、安全与自由生活、享受文化产品、城乡融合、社会凝聚力等维度。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③同时,“积极社区”需要重视社区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新发展理念将发展引导到社会民生的轨道,共享发展的过程就是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在民生改善与经济互动的双赢与协同共进中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深化了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关系认识。^④“积极社区”注意促进社区内外的共享,注意发展更有质量和更富活力的社区教育,增强看得见的健康获得感,推进社区服务载体建设等,^⑤提升社区及成员在健康生活、就业与共享、教育机会均等方面的发展基础。“积极社区”还需要积极促进社区多一些人文关怀和更有民生温度,提升社区居民着力创造品质生活,分享社区发展成果以及促进改善生活、增强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美好生活期待,关注社区居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法治观念和现代意识增强、新的社会习俗风尚的培养,^⑥关注人际关系和个人品德的改善,^⑦从整体上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和社区文明程度。

基于上述理解,积极社区是以社区民生和社区发展为导向,社区各方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推动社区形成较强的内生发展动力,凝结稳固和活跃的社区共同体,共同提升社区文明程度、创造社区高品质生活的社区。新时代,城乡社区已经成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的重要场域,也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展的重要窗口,推进“积极社区”建设,是解决目前社区发展的困境,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① 罗伯特·B.丹哈特等:《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0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④ 李猛:《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法论创新》,《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⑤ 阎加林:《上海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实施路径》,《科学发展》2020年第1期。

⑥ 文军:《我国城市“文明社区”指标考核体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⑦ 童世骏:《文明社区的时代特征》,《社会》1997年第9期。

三、公益慈善：积极社区的新公共生活

“积极社区”需要注入更多的积极元素，公益慈善无疑是最具积极能量的元素之一。中国传统慈善具有利他性、社会性、救助性等特点，而现代慈善具有鲜明的组织化、制度化、规模化等特点。社区公益慈善可以成为“积极社区”重要的助推器。推进社区公益慈善，需要将尊重传统和尊重现代慈善规律有机地融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合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之路。^①

慈善是一种古老且普遍的行为，慈善事业在中国很早就成为促进社会治理、维持社会物质文明再生产的必要手段。^② 学界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儒释道等多元文化对中国慈善发展影响深远，仁爱、善恶报应、慈悲因果、兼爱等理念支撑传统慈善活动，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慈善活动大多是长期稳定社会结构下的邻里互助行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社”作为一种自愿结合的民间互助团体，其活动明显带有互助性质。^③ 中国传统“慈善”是一种基于家庭情感的爱，而中国“社区”就是“家”的一种扩大。^④ 明清时期出现过面向社会的慈善实践，涵盖义仓、育婴堂、恤嫠会、立贞堂、水龙局、救生船、粥厂、务本堂、保甲局、癰瞽局和施材局等慈善形式。中国的“善举”是一种考虑祸福的行为，其动机来源于为善者必有善报的观念，正因为此学者认为善会善堂以它原有的形式是不能成为近代地方自治的前身的，^⑤ 但传统中国公益慈善扎根于国家的伦理道德与文化传统的特点，在推进社区公益慈善过程中需要充分予以吸收。

学界认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客观规律主要表现在志愿性、公益性、平等性、社会性以及法治与自治相结合上，^⑥ 郑功成概括了现代慈善的“以社会捐献为经济基础”“以社会成员的慈爱之心为道德基础”“以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为发展基础”等方面特征。^⑦ 贝克尔在社会性慈善行为和基于亲缘关系的互助行为之间作出区分，认为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慈善”或“博爱”，^⑧ 现代公益慈善发展中，公益慈善组织具有健全的理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组织架构，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产管理等方面具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和要求，同时法律法规对公益慈善组织行为设定了较高的要求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惩处措施，使得现代公益慈善组织具有天然的信任优势，这种优势在公众处于信息弱势或不对称地位时就充分显现出来，并将慈善组织的“不分配限制”当做值得信任的信号。^⑨ 现代公益慈善对信任的珍视和对制度化、开放性等方面的推崇，在推进社区公益慈善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理论界和实务界认为慈善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应急救援、脱贫攻坚等重大

①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社会治理》2020年第10期。

② 李培林：《慈善事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华文摘》2015年第10期。

③ 王子今等：《中国社会福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④ 吴子明：《“社区慈善”背后的社会趋向反思》，《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⑤ 夫马进、胡宝华：《中国善会善堂史——从“善举”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7卷。

⑥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社会治理》2020年第10期。

⑦ 郑功成：《当代中国慈善事业》，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⑧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三联书店，1995年，第321页。

⑨ Sargeant Adrian, Lee Stephen, "Donor Trust and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the U.k. Charitable Sector: the Impact on Behavior,"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4, 33(2).

任务中,通过募集款物等方式发挥积极功能,^①不仅丰富了城乡社区贫困治理资源,创新了贫困治理的方法与模式,^②还通过志愿性、组织化的方式推进社区公益慈善,公益社区的最大鲜亮之处就是将集体行动和社区公益集于一身,最终有利于社区发展。^③我国由于社会结构变迁和居住空间商业化带来社区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社区社会资本出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切实提高社会协同水平。^④当然思考社区公益慈善的发展不能仅从力量培育方面思考社区公益慈善,还需要结合新时代社区的使命和任务思考社区公益慈善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方向。系统理论主张所有的有机体都是系统,有三种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即非正式或原生系统(比如家庭、朋友、同事)、正式系统(比如社区组织、商会)、社会系统(比如医院、学校),^⑤生态系统理论关注与环境互动,将生态系统分为个人、家庭、文化、环境、结构和历史五个部分,^⑥为公益慈善助力社区和人的发展提供系统思考借鉴。

社区尽管是个区域概念,具有地理边界,但社区内的主体、事务、关系等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导致基层社会的日常运作呈现出行政化与自治化相互交缠的局面。^⑦与此同时,城乡及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障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提出了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新课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⑧共享发展将责任意识注入资源的配置机制中,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⑨因此社区公益慈善需要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立足社区实际和资源禀赋开展积极工作,促进社区的共享发展。

社区公益慈善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能够润滑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团结、助力精神富裕,是新时代社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需要系统地看待社区公益慈善问题,将社区公益慈善融入社区运行系统,催动社区系统更高效运转,提升社区功能。学界意识到社区作为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的凝结,情感政治、生活政治成为它的基本面向,社区公共生活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和利益性公共生活,^⑩因此社区公益慈善也是社区公共生活的一种,在推进“积极社区”建设中必然是社区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积极元素,基于此可以初步勾勒出社区公益慈善构建“积极社区”的逻辑框架(图1)。

① 陈斌:《中国慈善组织参与应对突发事件:嬗变历程、基本问题与优化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② 谢琼:《贫困治理:中国慈善组织的实践与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17年第4期。

③ 刘建军:《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④ 张文宏、张君安:《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⑤ 参见 Pincus Allen, Minahan Anne,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and Method*,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73.

⑥ 卓彩琴:《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脉络及展望》,《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⑦ 田毅鹏、薛文龙:《“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⑧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6期。

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⑩ 刘建军、张兰:《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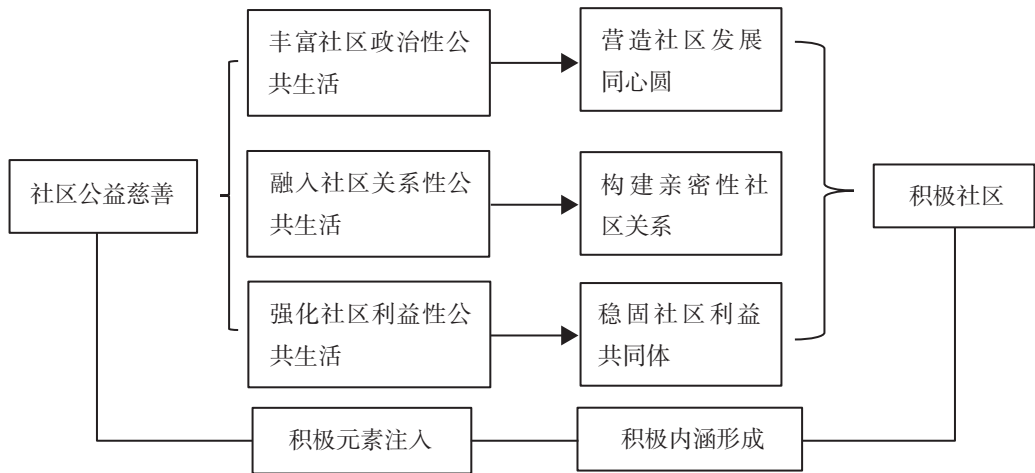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公益慈善构建积极社区的逻辑框架

（一）以公益慈善培育“积极社区”新的政治性公共生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慈善事业是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满足巨大人口规模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都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参与和融入空间。公益慈善事业唯有坚定且全面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② 社区公益慈善必须积极融入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若干重要任务，如“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健康中国战略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③ 这些任务都是社区公益慈善可以融入的重要维度，也为社区公益慈善融入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这种融入过程中，公益慈善可以成为“积极社区”中一种社区成员的新的政治性公共生活。

（二）以公益慈善培育“积极社区”新的关系性公共生活。社群生活不是在统治逻辑和商业逻辑中展开的，社群生活讲求互助、群助，它是一种以互爱、互助、互信为基础的交往和秩序。^④ 交往和秩序是在整合中实现的，整合是社会发展的逻辑，帕森斯将社会整合界定为调整和协调系统内各部分之间关系的一种结构，以维持系统均衡、稳定，防治紧张关系和不一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杨方方：《慈善事业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偏离与矫治》，《社会保障评论》2024年第1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刘建军：《居民自治指导手册》，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4-66页。

致对系统的瓦解。^① 系统整合概念关注系统社会单元之间关系, 社会整合概念关注行动者之间关系,^② 吉登斯发展出时空整合理论, 主张用社会整合、系统整合概括来整合机制。^③ 社区公益慈善首先在社区内部要实现社会性慈善与地缘性互助的整合, 并对不同主体、社区不同子系统进行积极整合, 在更大时空范围内通过散布在时空之中的大量日常接触维持社会系统,^④ 通过社区公益慈善主体之间的理性沟通, 从目标、价值、行动等层面创制和维持共同在场场景, 在逻辑上形成整合所需的一致性。^⑤ 社区公益慈善通过积极链接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社区内外多元主体, 不断积极发现和创设社区公共议题, 以一定的空间、平台为载体促进社区内部和内外“对流式交往”,^⑥ 促进社区内部和社区内外分歧、对立的消弭。在各种互动、整合过程中, 公益慈善成为“积极社区”中社区成员的一种新的关系性公共生活。

(三) 以公益慈善培育“积极社区”新的利益性公共生活。共生被认为是支配城市区位秩序的最基本因素之一, 其内部各组成部分要相互依赖生存,^⑦ 有机式共生社区是指由政府、市场、社会和居民通过主体间共信共生、开发整合多方资源, 达到互利共享的均衡状态并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地域性开放系统。^⑧ 共生的重要基础是共同利益的发现与持续支撑, 学者也已经观察到, 立足社区的小型慈善组织不仅为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而且增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⑨ 现代因素强调“分”, 注重分权与制衡, 使得各方主体职责明确、各司其职; 而传统因素又强调“和”, 注重整合与共治, 能将各方主体的力量结合起来, 发挥共同体的最大力量。^⑩ 无论是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的社区公益慈善,^⑪ 都可以促进多元主体围绕公共议题开展互动协商, 并在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合作回应社区需求、解决社区问题的过程中, 形成社区密集的互动场域, 并在频繁的互动中形成社区共同记忆, 催生社区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 进而促进社区融合与社区团结, 形成社区共同体。社区公益慈善在推进社区的维权、赋权和社区集体行动过程中, 推动社区成员参与和协作意识的复苏, 社区共同利益不断被发掘出来, 社区各方主体在维护共同利益的交互活动中从联动走向联合, 进而公益慈善也可以成为“积极社区”中社区成员的一种新的利益性公共生活。

① 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 第60页。

② David Lockwoo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G. K. Zollschan and W. Hirsh (ed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64, p. 244.

③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纲要》, 三联书店, 2016年, 第92页。

④ 谢立中:《主体性、实践意识、结构化: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再审视》, 《学海》2019年第4期。

⑤ 赵文聘、于海利:《从吸纳到整合: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策略和逻辑》, 《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

⑥ 田毅鹏:《乡村未来社区: 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期。

⑦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年, 第76页。

⑧ 樊红敏、刘晓凤:《共生理论与有机社区——城市有机共生式社区建设模式的提出与构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

⑨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社会治理》2020年第10期。

⑩ 蓝煜昕、林顺浩:《乡情治理: 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2期。

⑪ 高静华:《利他还是交换: 群体视角下慈善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1期。

四、“积极社区”中公益慈善的推进维度

党和政府结合中国传统和社会建设需要,融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社会公益慈善各方主体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系统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和政策实践,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明确了超越西方慈善的发展目标和道路。^①新时代社区公益慈善需要丰富“积极社区”政治性公共生活,融入“积极社区”关系性公共生活,强化“积极社区”利益性公共生活,并通过三个推进纬度协同发力激发社区内在动力,促进社区整体发展,提升社区品质和文明程度。

(一)公益慈善丰富“积极社区”政治性公共生活。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必须首先积极融入社区的生活,当前社区直面党建引领的政治逻辑、治理重心下移的行政逻辑、选择性参与的生活逻辑,^②这三种逻辑的共同作用,作为社会力量的社区公益慈善事业通过积极回应社区需求、积极解决社区难题,可以积极提升党和政府基层的凝聚力、动员力和亲和力。另一方面,社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③是国家治理与生活共同体的统一。^④社区公益慈善需要营造社区发展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⑤社区公益慈善营造的同心圆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党和政府与公益慈善相关的企业、组织、个人具有天然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党和政府把握社区公益慈善发展的动力、方向和道路,^⑥社区公益慈善其他各方的工作目标也是为了社区和社区成员发展。同心圆中各方基于共同目标和公共利益具有天然一致性,社区公益慈善需要聚合不同的主体资源、功能,充分发挥多样性优势,由政府派生的“单一驱动模式”转变为政府、企业、社区、团体、个人的“多元共建模式”。^⑦学界呼吁大力培育社区型慈善组织,鼓励社会慈善机构直接抵达社区或者透过社区慈善组织直接服务于社区居民,^⑧通过积极推进社区公益慈善,丰富社区公益慈善服务内容,提升社区公益慈善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积极融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丰富“积极社区”政治性公共生活。

(二)公益慈善融入“积极社区”关系性公共生活。社区公益慈善的发展需要置于社区共同体目标下进行谋划,在整合视角下推动,社区公益慈善具有的互助等功能有助于推动社

① 赵文聘、于海利:《从吸纳到整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公益发展策略和逻辑》,《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

② 吴晓林:《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7期。

③ 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④ 刘建军:《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⑤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08页。

⑥ 刘亚娜:《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中美比较的借鉴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8期。

⑦ 朱光磊、陆明远:《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二重性”及其监管问题》,《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2期。

⑧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成效、问题与制度完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区成员紧密联系的形成,进而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以更好地实现社区融合与社区团结。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积极构建亲密性社区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作为社会信任的基础,是一个共同体内不可或缺的“粘合剂”,^①但在陌生人社区,居民并没有内在驱动力去构建亲密性社区关系,而且社区成员往往因不同职业、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等产生隔阂甚至冲突。社区公益慈善需要在提供服务、满足社区成员和社区发展需求过程中,创造社区相关主体之间的更便捷、更频繁地进行交往互动,促进社区相关主体以新的视野、新的观念看待社区内外关系,通过重构社区与居民之间、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最终提升居民参与的主体性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②推进社会网络资本的构建、维系。另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积极提升和保持社区情感。当前情感在共同体内逐渐成为各个主体之间交往并构建内在网络的重要因素,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不能忽视的角度。^③“情感体制”就强调个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情感体制渗透在社会实践的价值中。^④社区公益慈善可以充分发挥社区公益慈善机构、社区公益慈善参与者、社区志愿者等对社区全龄群体、社区共同议题等方面的精准把握,在社区公益慈善项目中体现对社区全龄群体、社区共同议题等社区重要事务的关注,社区公益慈善实施的内容吸引着社区多元主体间互相流动,促进社区成员间互相理解和彼此借鉴,消弭地域文化、收入、职业等方面鸿沟,促进实现社区不同主体间互相融合,并通过共同参与行动激发社区主体共同的情感,形成以情感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构建。基于整合视角,社区公益慈善可以大力提升社区服务、情感、关系等方面的能力,进而提升个体对社区的依赖,也能够有效促进个体的社区参与,融入“积极社区”关系性公共生活。

(三)公益慈善强化“积极社区”利益性公共生活。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场景,而第三次分配核心机制是公益、利他和非营利等社会机制,主要表现为人类交往行为及基于交往理性和价值理性所构建的生活世界,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是更加广阔的社会及其主体人,^⑤社区品质生活离不开便利的衣食住行以及就医、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社区公益慈善需要基于全龄友好理念,及时发现社区成员的需求,积极协助社区解决一老一小、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协助破解服务社区居民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努力消除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上的不均衡、不协调现象,优化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及时将社区的关爱触达到有需要的社区居民,弥补公共服务覆盖不足,为社区和成员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增强社区温度,不断增进社区成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的公共性使其成为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重要治理场域,社区公益慈善应当积极培育和凝结社区新公共利益,发掘社区公共需求,推进聚合社区各方主体的集体行动,促进社区成员自觉

①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② 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③ 马超峰、薛美琴:《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回归与张力调适》,《兰州学刊》2018年第2期。

④ 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⑤ 王名等:《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地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通过利用技术手段为社区公益慈善参与主体提供共同记账、同步发布信息和数据的可能性,有助于更清晰展示各主体的社区公益慈善数据画像,^①可以促成社区公益慈善相关主体间经常性接触和数据互通,获得在场般体验,并通过日渐深入的社区公益慈善实践,实现信任倾向凝结和维持信任关系,^②进而形成不断稳固社区利益共同体,强化“积极社区”利益性公共生活。

五、结语和思考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新时代社区发展有了新的历史使命和要求,需要积极提升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积极促进稳固共同体的形成,积极面向高品质生活,提升社区品质和社区文明。

“积极社区”提供了一个破解当前社区发展难题的视角,公益慈善具备的特殊功能,使其能够成为“积极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力量。而将强调亲友相济、邻里互助、家庭保障的社区互助与当代慈善的现代性进行有效结合,并将公益慈善放置到社区情景中形成的社区公益慈善自然成为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推进社区公益慈善过程中,需要深度融入到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中,激发社区内生动力,促进社区融合与社区团结,进而提升生活品质和社区文明,使社区公益慈善成为“积极社区”中社会成员的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利益性公共生活。

政治性公共生活、关系性公共生活、利益性公共生活三个维度在社区公益慈善推进过程中是并存的。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通过三个纬度的工作积极助力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有助于助力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在解决社区内部需求、难题中促进社区成员走向联动,并在新社区共同利益发掘、维护中走向越来越紧密的联合,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有机团结,促进城乡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不断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和社区文明程度。

当然,尽管当前社区公益慈善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社区公益慈善仍发生在城乡社区很小的领域和范围,社区公益慈善对社区内部很多问题、难题的解决仍难有作为。一是社区公益慈善作为政治性公共生活的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社区公益慈善相关方还没有从政治性公共生活的纬度思考和推进社区公益慈善。二是社区公益慈善作为关系性公共生活作用还不够突出,还需要各级党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参与支持,例如构建更顺畅的社区公益慈善与公共服务对接机制、积极引导社区公益慈善力量参与社区调研和社区协商、积极搭建平台为社区公益慈善对接资源等。三是社区公益慈善作为利益性公共生活的功能还没有有效发挥,需要社区公益慈善实施主体增强基本功,不断开发、拓展有效的工具、平台及项目,创新服务模式,培育和凝结社区新公共利益、满足社区发展需要的能力。

① 赵文聘:《数据画像:提升社会公益公信力的一个有益工具》,《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0期。

② 赵文聘、徐家良:《制度性组织、新纽带与再嵌入:网络公益慈善信任形成机制创新》,《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The Positioning and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Charity in the New Era

Zhao Wenpin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Administrative College,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Communities form the bedrock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ommunity development faces fresh historical missions and demands, requi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tive communities" to effectively tackl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Philanthropy is a key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se "active communities." Advancing a model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n urgent and critical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anthropic sector. This involves merging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charity with the modern attributes of contemporary philanthrop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political public life, relational public life, and interest-based public life—efforts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s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support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enhancing the mobilis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 the community level. By actively addressing internal community needs and challenges, communities can foster great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aboration. This approach also helps to identify and protect common interests within new communities, encouraging closer ties among members, promoting organic solidarity, and continual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and civility.

Key words: new era; active communities; philanthropy; public life

(责任编辑:高静华)